

越长越大越孤单

□ 崔立(上海, 公务员)



什么时候起, 女儿长大了?

我下班到家, 女儿不再像以前一样, 迫不及待地, 风儿似的扑在我身上, 将我紧紧地拥抱住。

现在, 我打开门, 放下包, 换鞋, 没有声音, 也没有人向我扑来。我抬头去看, 女儿坐在客厅的书桌前, 静静地在学习。似乎很不经意地, 女儿看了我一眼, 马上又把头埋下去, 笔头扭动着, 继续专心致志地在写。

时间已经到了近7点, 女儿应是吃好了晚饭。女儿的这些作业, 需要做到8点、9点, 甚至更晚。有时, 我还在怀念, 怀念以前的日子。以前, 女儿还小, 不用上学。晚饭后, 我牵着女儿暖暖的小手, 在楼下的商业街闲逛。我们从马路的一端, 走到另一端。又从另一端, 走回到一端。间或, 我们还走进

一些路边的店铺, 超市, 给女儿买上一点吃的, 喝的。女儿就很高兴。女儿的嘴张开着, 一直是带着笑的。女儿还说, 爸爸最好了, 常常给我买吃的。我笑着摸摸女儿的头, 疼爱地看女儿的脸。那段时光, 是我和女儿最亲昵最快乐时光。

后来, 女儿上小学了。上学后的女儿, 是有任务了。女儿的任务就是学习。女儿的学习不好, 时不时地, 在女儿的练习本上、试卷上, 看到无数个火红的叉叉。那些叉叉, 有时让我愤怒。女儿看我的眼神, 有了怯意, 有了犹豫, 还有无数的慌张。

现在, 女儿对着我, 话少了。偶尔, 我拉过女儿, 和她说话, 女儿的脸上总带着一丝不情愿, 嘟囔着嘴, 更多的是抱怨。

女儿说, 爸爸, 王洁清为什么每次考试

都能拿第一名?

女儿说, 爸爸, 老师让我们每个人都去竞选班干部, 我一定要竞选吗?

女儿说, 爸爸, 我天天在学习, 我好像都没有朋友了, 也不快乐了。

女儿说, 爸爸, 我可以不用上学吗? 我只想玩。

当然, 女儿也都只是说说的。女儿的眼睛亮亮的, 充满期盼又带有几分失落。

夜深的时候, 女儿已经睡了。我轻轻打开门, 走进她的房间。淡淡的月光下, 女儿静静地, 紧闭着眼睛。她似乎是梦见了什么, 小脚轻轻蹬了一下, 眉头皱得紧紧的, 绽出一条深深的缝。

她是, 又想到学习了么? 我的心头, 不自觉地哀叹了一下。



别永堂

□ 陈学伦(上海, 画家)

朱永堂走了。走得很突然。

如果他发病当日就去医院, 也许会度过险关。但是, 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结果。结果是: 我们失去了一位朋友, 摄影圈少了一个同志。

我与永堂相识近四十年。他是上世纪60年代大学生, 毕业分配在贵州省电台。因夫妻分居两地, 托关系调入上海。1978年上海某报复刊。不久, 永堂进了报社。

云贵高原的风雨抹去了这位复旦学子的风华。三十出头的他, 显得沧桑。故大家开始就称他为“老朱”, 好像从未有小朱之说法。老朱做编辑, 偶而写稿, 笔名是堂字的拆写——尚土。我们给这笔名加了下联, 合起就是“上吐下泻”。老朱笑而不答。

老朱住房很差。据他说: 室外大雨, 室内小雨; 室外零度, 室内有薄冰。老朱

在陋室种绿养花, 自得其乐。故大家送他雅号——花痴。

老朱为人随和, 但不是无原则的好好先生。某记者在来稿中注明某某段文字不得删改。老朱无意斧正了他的锦绣文章, 他来找老朱问罪, 老朱不甘示弱, 据理力争。

以世俗眼光看, 当时报社像老朱这样拥有名牌大学学历者不多。只要老朱有“心”, 他的职级就会上浮, 住房等各方面条件都会改善。但老朱缺乏的就是功利心, 他是个按兴趣行事的人。当年外语热时, 别人学英语、日等热门外语, 老朱选学世界语, 当了柴门霍夫的弟子。

老朱一心想当记者, 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也许这是他离开报社的原因之一吧。他去了某工业公司工会。有一年, 老朱组织公司摄影小组去黄山活动, 他邀我参加。

我至今印象很深的是老朱在巨大山岩上拍摄时的雄姿, 当时感觉他身上有古代侠客的影子。

报社庙小和尚多, 先后离开报社去别处高就的人很多。有的去其他报刊、电视台; 有的当专业作家、当老总; 也有去更重要岗位工作。岁月如流, 曾经的同事有些是萍水相逢一时间, 而我和老朱始终保持联系。前年和去年, 我在澳大利亚期间还常与老朱通越洋电话。我记住他家电话号码尾数是776779。老朱说是吃吃肉吃吃酒。

老朱的追悼会我没有参加, 可能是他的摄影朋友, 也是我的朋友以为我还在澳洲而没通知我。我并不遗憾。因为我不愿将耳听的消息变成眼见的现实。我宁肯相信老朱仍在电话机那头吃吃肉吃吃酒。把最后的告别变作永久的思念。